

〔宋〕范成大撰

严沛校注

桂海虞衡志校註

卷之四

佳山廬志

校註



桂海虞衡志校注

〔宋〕范成大 撰
严 沛 校注

广西人民出版社

桂海虞衡志校注

〔宋〕范成大 撰

严 沛 校注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西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7 印张 130 千字

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100 册

书号：12113·36 定价：1.20 元

前 言

范成大，字致能（一作至能），号石湖居士，平江府（今江苏省苏州市）吴县人。生于北宋钦宗（赵桓）靖康元年六月，卒于南宋光宗（赵惇）绍熙四年九月（1126—1193），历南宋高宗、孝宗、光宗三朝。

范成大的家世，并非豪门显宦，他的父亲范杲始由宣和六年（1124）进士官至秘书郎，不过是个校理国家图籍的小官。范成大出生的那年，正是金兵攻陷太原，分两路长驱南下，兵临汴京（开封）城的倥偬岁月。次年（1127），徽宗、钦宗父子被掳北去，举国震惊，高宗（赵构）即位南京（河南商丘），仍一直往南逃跑，富庶的江南，被敌人焚掠一空；后来收拾临安（杭州），开创了南宋“偏安”的局面。但赵构一贯执行卖国投降的政策，荒淫享乐，歌舞西湖，不思振作。在那国事艰难、生灵涂炭的日子里，范成大又遭遇了双亲连续亡故的惨变，国仇家难，纷至沓来，使得他意志消沉，隐居山野，孤贫自励，无意于科举功名。直到他二十八岁那年，由于他父亲的同年王彦光的劝勉，他才潜心举业，中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从此开始了他以后三十年的仕宦生涯。

范成大从政之初，由于没有亲朋的提携，在仕途上是很沉滞的。从绍兴二十五年起，他做了六、七年的徽州司户参

军，直到四十岁才得离徽州入杭，去做京官，由圣政所检讨官历枢密院编修、秘书省正字、校书郎，升到著作佐郎，所任的多是史馆、图书的职务。乾道二年（1166），除吏部员外郎，刚刚转入政事部门，却又被言官指责为躐等升迁，只得请领“祠禄”归里。三年，起知处州。五年，任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国史院编修，后来又擢起居舍人兼侍讲，实录院检讨，仍旧是所谓“清职”。

这时期，赵构已经让位给他的养子赵昀，和金人订立了“隆兴和议”，南宋不再向金称臣，世为“叔侄之国”，“岁贡”也改称“岁币”了；但是宋朝皇帝仍须向金使行“跪拜受书礼”，这是赵昀在臣民面前无论如何掩盖不了的奇耻大辱。

乾道六年（1170），赵昀为了表示自己还有点“进取”精神，提出了索取河南“陵寝”之地的要求，派范成大以起居郎借资政殿大学士为“祈请国信使”，出使金国。国书中只说到索取“陵寝”的事，没有把改变受书礼仪一节载入，却要范成大到了金廷后自己设法去交涉。金法严厉，不许使臣私递书奏。范成大却在金国皇帝面前冒死拿出私书，要求接受。经过力争，迫使金国接受了。虽然跪拜受书礼并未因此得到改变，但范成大一反过去宋使那种卑躬屈膝的丑态，敢于冒死犯颜，却获得朝野一致的赞扬。由于他使金有功，得迁官中书舍人。

乾道七年（1171），范成大又做了一件令人赞许的事。当时赵昀要任用奸佞“外戚”张说签书枢密院事，物议哗然。可是朝中大臣们却畏惧张说的气焰，谁都不敢说话。范成大“当制”，扣留了“词头”，径向赵昀缴驳，从容喻谏，毫不畏惧，终于使张说签书院事因而作罢。这件事也为朝野人士

所称道，认为是范成大大义凛然的又一次表现。

尽管范成大在朝野中的声望日隆，但这时期赵昀所信任的却是一批奸佞之徒，正派的人都被排挤殆尽。范成大也不能在朝廷立足，又只好自动请领“祠禄”归里。

乾道八年(1172)冬，范成大得到起复，知静江府（治所在今桂林市），广西经略安抚使，九年三月到任。这时，广西财政十分窘乏，专靠盐运之利。而盐运收入，又尽被漕司（转运使）取去，以至吏俸及兵饷都无法支付，只好向老百姓增加临时摊派。范成大到桂后，首先奏请“裁抑漕司强取之数，以宽郡县”，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严惩不守法纪的地方官吏及少数民族“豪酋”，减少了人民所受的骚扰；在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设博易场，禁止私易；晓谕各族人民团结守法，比较公平合理地处理民族关系，使地方安靖；他曾嘱下属疏浚灵渠，又在桂林修复朝宗渠，修理风景名胜。他在广西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做了不少对地方有益的好事，给广西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淳熙元年（1174），范成大以敷文阁待制，知成都府，四川制置使。三年，大病求归。十一月，除权吏部尚书。五年正月，知贡举，寻兼直学士院。四月，以中大夫参知政事，又权兼修国史日历。才两月，为言官论劾，落职归里。六年二月，起知明州（今浙江宁波市），七年（1180）改知建康府（治所今南京市），兼行宫留守。自起知静江以来的十年间，范成大除了一度短期在朝之外，曾几次作封疆大吏。他在地方官任上，廉明清正，持平不阿，总是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尽力之所及，为地方人民做好事，诸如兴水利，恤贫民，除弊政，建良法，他都踏踏实实去做。周必大称他“所至礼贤下士，仁民爱物，凡可兴利除害，不顾难易，必为之”。

淳熙九年（1182），范成大以年老多病，乞求放归。此后十年间，他大多数日子是息影家园，养病吴土，实际已脱离宦海生涯了。

从范成大的一生看，他称得上是一个具有爱国爱民思想的比较正直的官僚。他在南宋封建政权中最初只是一个地位不高的词臣，逐步迁至宰执。由于他为人刚直，不同于当时南宋腐朽政权中的庸官俗吏，因此他屡遭排挤，在国家大政上没有发挥过重大的作用，没有过什么大的建树；而他在地方官的任上，却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所以向来为世人所敬重，为后人追念。但是，范成大到底是一个封建官僚，他的所作所为，当然是不会触犯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

二

范成大是个封建大官僚，或者说，是一个比较正直的封建大官僚，但是，他并不是以政治家的姿态而闻名于历史舞台上的。我们可以毫无疑义地说，他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他与同时代的陆游、杨万里、尤袤三人齐名，同被称为“南宋四大家”。他们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闪烁着灿烂的光辉。

范成大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在诗歌创作方面。南宋四大家，以陆游的名气为最大。但陆、杨两家早年的诗，都已佚去不存；尤袤的诗散佚更多；范成大晚年自编的《石湖居士诗集》，今存三十四卷，有诗词一千九百一十六首，可以说，他的全部诗作基本上都保存下来了。

范成大生当南宋偏安之际，当时国土遭受金朝统治者的蹂躏，整个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民族的压迫和阶级的剥

削，使人民陷于极度困苦的地境。范成大从少年到壮年，经历了这场历史的灾难，分尝了时代的痛苦，因此他的诗歌里含蓄着爱国爱民的思想。他的脍炙人口的《使金纪行诗》、《催租行》等诗篇便是这类诗歌的代表作。《使金纪行诗》共有七绝七十二首，把出使金国时一路所见的中原沦陷区的残破，金朝野蛮落后统治的景象和中原人民渴望光复祖国河山的强烈愿望都描绘了出来；《催租行》等诗对南宋官吏的残酷剥削作了有力的鞭鞑，对穷苦农民的惨痛遭遇寄予深厚的同情。范成大还享有“田园诗人”的称号，《四时田园杂兴》绝句六十首是他的田园诗中的佳作。这些田园诗超越了陶渊明、王维那类抒发闲适情趣的田园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江南农村的现实生活，开拓了田园诗的新境界。因此在诗坛上他卓然成为南宋一大名家。

范成大以诗著称，他的文章也是很出色和有名的。

《宋史·艺文志》别集类著录：范成大《石湖大全集》一百三十六卷。又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十八别集类下亦云：《石湖集》一百三十六卷。这是范成大自己编定的文集，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即使把《石湖大全集》中诗集三十四卷除去，则文集也超过一百卷了。宋人洪适《范成大秘书省正字制》中说他“学瞻而文缙，耻美于前人。（《盘州文集》卷二十二）楼钥《资政殿大学士通议范成大转一官致仕（外制）》中称他“文章甚伟，崔、蔡诚不足多；制诰尤工，王、杨当为之伯”。（《攻愧集》卷三十八）他的挚友周必大所作的《范公成大神道碑》说他“天资俊明，辅以博学，文章瞻丽清逸，自成一家”。（《周益国文忠公集·省斋文稿》卷二）这里所说的“文章”，是不包括诗在内的。杨万里在《石湖先生大资参政范公文集序》中称赞他的文章说：“训

诘具西汉之尔雅，赋篇有杜牧之之刻深，骚词得楚人之幽婉，序山水则柳子厚，传任侠则太史迁；至于大篇决流，短章敛芒，缛而不酿，缩而不隘，清新妩丽，奄有鲍谢，奔逸隽伟，穷追太白；求其只字之陈陈，一倡之呜呜，而不可得也。”（《诚斋集》卷八十二）可见南宋当时人对范成大的文章评价是很高的。

范氏的《大全集》卷数虽然很大，但今日传世的作品却不多，除《石湖居士诗集》三十四卷以外，只有《吴郡志》、《揽辔录》、《骖鸾录》、《吴船录》、《桂海虞衡志》、《菊谱》、《梅谱》等几部专集，其他都已散佚了。近人从古代的类书、笔记、方志、史书、石刻以及诗文别集中进行辑佚，辑录出范成大撰写的诏表、制诰、札子、书启、序跋、铭记等类佚文不过数十篇，大部分是范氏的应制文字或酬世之作，有关政论、哲理、文学方面的著述不多，使我们对于范成大生平历史和思想的研究，感到资料远远不足。目前我们所见到的范成大的文章，虽然不能算是范氏散文的代表作，但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窥见范氏的文风是质朴无华，淳厚道健的。他传世的几本专集，记载了他使北、入桂、出蜀时沿路的所见所闻，描绘了各地的山川形胜，风物土宜，社会风情，人民生活，都写得那样真实自然，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从现存的《永乐大典》残本来看，明初编纂成的这部大书，是大量辑录了《石湖大全集》的文字的，可见当时这部集子还传世。明代中叶以后，各家所辑的类书中，已经看不到《石湖大全集》的文字。清初的文人和文集，已经很少提到《大全集》这部书，可知范成大的文集，很可能是在明代后期散佚的。清初辑佚之风大盛，开四库馆时，曾从《永乐

大典》中大量搜辑佚书，但当时只注意经、史、子等部，集部的书搜辑得甚少，范成大的文集也无人辑录。至于范成大的诗词，靠清人先后重刊、辑刻，得以流传下来。他的几部纪行专集，所谓《石湖三录》等，明人清人所辑的丛书多有收入，是比较容易见到的。

三

《桂海虞衡志》是范成大传世的几种专集中的一种。虞衡，古时官名，是掌管山林川泽的官。范成大帅桂二年，对广西的山川形胜、风土人情，十分关切，对广西人民也产生了“惓惓”之情（范成大语），这本书是他写的关于广西山林川泽之事的记录。

今本《桂海虞衡志》共十三篇，篇目为志岩洞、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杂志、志蛮。它记载了宋代广南西路（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全部及广东省的一部分）的山川形胜，洞穴幽奇，金石矿藏，各种诡异器物的手工技艺，各种珍奇动植物的形态与特性；还有风土人情，气候习俗，聚落特征，民族关系，都有所涉及。它的内容十分广泛，反映了宋代广西的社会、经济、文化、民族等各方面的状况。范成大是当时地方最高行政长官，接触面很广；他又究心吏治，洞察民情，耳闻目睹，所知极多，所以他的记载详赡，识见博洽，有些地方可补正史之不足（如《志蛮篇》可补《南蛮传》），有些地方可正史志之讹误（如《图经》误云“融州出丹砂”），有些地方可纠传闻之失实（如世传所谓“二广出香”），有些地方可提供科学研究之资料（如志禽兽虫鱼、花果草木）。又兼以文字质朴典雅，记载翔实，没有虚饰浮夸之词。由于它

的史料价值很高，宋元以来一直为学者所重视。明清时代的广西方志、公私文书简牍以至学术著作，都大量征引了《虞衡志》的资料。就是在今天，仍不失为我们研究古代广西十分重要和有用的参考资料。

当然，《桂海虞衡志》这部书也有其不足之处和缺点的。首先是本书所录，仅为“方志所未载”，“他州所有，皆不录”，这就使本书的内容受到一定的局限，而不能藉以窥见当时广西某个方面的基本面貌；各篇内容繁简不一，有些篇目所记过于简单（如《志酒》仅三种）；更重要的，作者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在记述少数民族的社会习俗中，往往责其“荒怪”、“诡异”，流露出轻蔑嘲笑之情，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往往夸示了“羁縻”、“驾驭”之术，表现了大汉族主义思想。我们阅读本书时，应持批判的态度。

《桂海虞衡志》这部书，是范成大于淳熙二年（1175）“徙镇全蜀”，由桂入川时在途中写的。他在《自序》中说：“道中无事，时念昔游，因追记其登临之处，与风物土宜，凡方志所未载者，萃为一书，蛮陬绝徼，见闻可纪者，亦附着之。”所以历来各家书目，多把它归入史部地理类。《宋史·艺文志》著录《桂海虞衡志》两见：史部地理类作三卷，传记类作一卷；《范公成大神道碑》记载为一卷，《直斋书录解題》卷八著录作二卷，《郡斋读书志·附志》卷五上著录作三卷，《文献通考·经籍考》著录作二卷。这几个宋人著录的卷数虽有差异，而内涵则是相同，因为《石湖大全集》卷数为一百三十六卷，《石湖诗文集》为一百三十卷（见《四部丛刊》初编《石湖居士诗集》范成大之子范莘、范兹跋及目次后顾嗣立题识），《石湖大全集》多收之六卷，即《揽辔录》、《骖鸾录》、《桂海虞衡志》、《吴

船录》四书各一卷，《梅菊谱》一书作二卷，合《石湖诗文集》，正符一百三十六卷之数。可见，不论各家著录《桂海虞衡志》卷数之多少，它是作为一个整体被收入《石湖大全集》里的。

《桂海虞衡志》大抵在南宋时已有了刻本。南宋末年一位著名学者黄震，读过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写出了一部读书笔记，其中有的抄录了范氏的原文，有的是节文，有的是黄氏自己的读后评述（见《黄氏日抄》卷六十七）。宋末元初，胡三省音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好些地方征引了《桂海虞衡志》。他们当时所见到的，无疑是完整的宋刻本。这种完整的原本，直到明初还存世，因为编纂《永乐大典》时，《石湖大全集》还被大量地采录。可是，到了明代后期，便出现了一种与《石湖大全集》所收的《桂海虞衡志》不同的本子，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今本”。（对“今本”来说，收入《石湖大全集》的便是“旧本”了。）今本《桂海虞衡志》大大地删削了旧本的内容，今本《桂海虞衡志》的出现，可以说是明人有意识地对古书进行改窜这种恶习所造成的。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说：“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日知录》卷十八“改书”条）这句话正好道出了明人刻书对古籍的戕害。今本《桂海虞衡志》的出现始于何时，我们还未能确定，从现存的明代丛书辑辑的情形来看，可以说至迟当不晚于嘉靖年间（陆楫编纂的《古今说海》丛书已辑入），但在当时旧本仍并行于世，所以李时珍等学者著书时还能见到宋刻本。直到清初康熙间汪森编《粤西丛载》，其卷一“各郡碑目”中，还列《桂海虞衡志》二卷，而且《粤西丛载》所引《虞衡志》的文字，有许多是今本《虞衡志》所没有的。到了乾隆

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收入这部大型丛书的《虞衡志》，是“两江总督采进”的一卷本（见《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桂海虞衡志提要》），显然，旧本这时候已经散佚找不到了。

旧本《虞衡志》的面貌如何，我以为黄震《黄氏日抄》所录的《虞衡志》札记是反映了它的本来面目的。根据《黄氏日抄》的记载，旧本显然也是分为十三篇，其篇名及目次与今本基本相同（仅《志岩洞》篇黄氏作《志山》，余同），条目大致也是一样。但是，旧本所记载的内容，有许多是今本所无的，仅仅《文献通考·四裔考》中所引《志蛮》之文（今本所无的），诚如纪昀所说，已经是“几盈一卷”了。可见旧本的篇幅要比今本大得多，内容要丰富充实得多。即就今本来看，《志酒》、《杂志》两篇条目甚少，《志果》、《志草木》两篇许多条目仅寥寥一二语，与其他诸篇相较，显得甚不相称，亦足以说明旧本被删削得非常严重。至于今本《桂海虞衡志》，皆十三篇，各丛书所收的本子的篇目与篇次都是相同的，只是各本在文字上间有差异罢了。

我对《桂海虞衡志》的整理，着眼在校勘与辑佚方面，多下一点功夫。本书的校勘，是以影印明刻本吴琯的《古今逸史》丛书本作底本，而以《古今说海》、《学海类编》、《知不足斋》、《说郛》、《秘书二十一种》、《百川学海》、《说库》等丛书以及有关的地方史志来进行互校；除此以外，还用了一些类书（如《永乐大典》残本、《古今图书集成》、《广群芳谱》等）和有关的专著（如《本草纲目》、《螭范》等）来作参校，磨勘得失，择善而从。注释方面，务求简明扼要，切中要旨。对于一些史实、典故，尽量注明出处，并充分利用同时代人的著述，作历史性的说

明。至于文字训诂，除个别词句外，一般都不加疏解，以省篇幅。

如上所述，旧本《虞衡志》曾为明人大量删削，其佚文常见于各种类书及各种有关的专著之中。我在校注的过程中，搜集了不少佚文。这些佚文，凡部居明确的，就分门别类，归入各篇各条，写在校记里面；凡内容比较复杂，部类不明，或今本无此条目的，就别立《桂海虞衡志佚文》一篇，列在正文篇之后。宋人黄震《黄氏日抄》和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四裔考、舆地考录存《虞衡志》的佚文，比较集中，我把它们分列二目，置于佚文篇中，不把它们分散插入正文的各篇各条，这样既保持了这两部书所提供的佚文的完整性，也免致把今本《桂海虞衡志》支离割裂。至于散见于各种类书及专著中的片断佚文，部居不明的，则列入“佚文拾零”一目之中。

这个校注本，除做了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这几方面的工作之外，还加上了几种附录：一是作者传记，选录了《宋史本传》及对范氏生平介绍得更为详尽的周必大撰的《范公成大神道碑》；二是历代著录及评论；三是校注参考书目。其目的都是希望能对读者了解本书有所帮助罢了。

《桂海虞衡志》这部书，自宋元以来历代都为人们所重视，向来学者多所征引。但是过去似乎还没有人给它校注过。根据许寿裳录存的《鲁迅日记》片断：“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二日，晴。夜以明抄《说郛》校《桂海虞衡志》。”（《鲁迅日记》下卷10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可见，鲁迅先生是很看重、并已亲手校勘过这部书。鲁迅先生的校本迄今未见公诸于世，可能已随他一九二二年的日记一起散佚了，这是非常可惜的。鲁迅以后，至今似乎还没有人校注

这部书。

我不揣愚昧，承担了前人所未完成的工作。由于个人学识浅陋，校注中一定有许多错误或不当之处；又因时间匆促，有关资料查阅未周，遗漏必多。敬希读者和专家们不吝指教！在校注过程中，曾蒙我的师长和同志们热情指导与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严 沛 1983年10月于独秀峰下

DB20/08

目 录

前言	(1)	
《桂海虞衡志》序	(1)	
《桂海虞衡志》正文	(5)	
一 志岩洞	(5)	
二 志金石	(20)	
三 志香	(27)	
四 志酒	(36)	
五 志器	(39)	
六 志禽	(49)	
七 志兽	(55)	
八 志虫鱼	(65)	
九 志花	(72)	
十 志果	(80)	
十一 志草木	(100)	
十二 杂志	(110)	
十三 志蛮	(115)	
《桂海虞衡志》佚文	(124)	
一 《黄氏日抄》录存佚文	(124)	
二 《文献通考》录存佚文	(147)	
三 佚文拾零	(172)	
鸡卜	湘漓二水	灵渠 (三则)
铍嘴	秦城 (二则)	蛇毒草